

中 国 经 济 学 博 士 论 丛

中国三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 的 乡 - 城 迁 移 研究



中国经济学博士论丛

朱镜德 著

ECONOMICS
DOCTOR

ECONOMICS
DOCTOR

ECONOMICS
DOCTOR

ECONOMICS
DOCTOR

ECONOMICS
DOCTOR



中国经济出版社

内容提要

中国乡—城劳动力迁移现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然而现有的西方关于乡—城劳动力迁移的理论，或因其重要假设不能在中国得到统计验证（如两部门模型），或因其理论未能形成系统体系（如三部门学说），或因其理论结论及其开出的药方远离中国国情，似乎均难以为中国现阶段乡—城劳动力迁移提供充分的理论指导。鉴于此，本文运用西方经济学和人口学理论，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建立了三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两阶段乡—城劳动力迁移理论模型，并提出关于乡—城劳动力迁移的两阶段战略构想；同时本文还就中国乡—城劳动力迁移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做了实证分析。

全文共分六章，各章内容如下：

第一章：导论。阐述了研究中国乡—城劳动力迁移重要的现实意义并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创新点和资料来源。

第二章：当代西方人口迁移理论评价。主要是对西方发展经济学若干有关乡—城劳动力迁移的重要理论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包括刘易斯模型、劳动力剩余两部门模型、新古典两部门模型以及托达罗模型等；并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就其贡献和不足作了简要的评价。本文认为，用上述理论来解释或指导中国

现阶段的乡—城劳动力迁移有着明显的局限性。

第三章：三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两阶段乡—城迁移理论。此为本文理论之核心。在该章建立了三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乡—城劳动力迁移理论（模型）：本文在此首先提出了（区别于三部门概念的）三元劳动力市场（城镇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城镇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这一新概念；并认为中国乡—城劳动力迁移将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在第一阶段，迁移主要发生在城乡两个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之间；而在第二阶段，迁移则将主要发生在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和另两个劳动力市场之间。

第四章：中国乡—城劳动力迁移分析。主要探讨了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乡—城劳动力迁移的决定因素、中国乡—城劳动力迁移的特点及乡—城劳动力迁移的流向。本文认为影响中国乡—城劳动力迁移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有三：一是国民生产总值尤其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使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吸纳农民工的能力和潜力进一步增大；二是城乡两个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工资或收入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三是国家关于乡—城迁移政策有限制的放开使这种迁移活动得以在城乡两个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范围内进行。关于中国乡—城劳动力迁移特点有如下几个：在城乡两个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范围内进行的乡—城迁移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迁移者既未能融入其所在城镇，也未割断与农村的经济联系；此外，乡—城劳动力迁移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迁移的速度快、规模大，但（迄今为止）尚未给城市造成太大的就业压力。

第五章：乡—城迁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关系分析。主要探讨了与乡—城劳动力迁移有关的若干问题：关于农业经济发展，本文认为乡—城劳动力迁移对农业具有正负两个方面的

影响，但负面影响的根源在于耕地资源重组机制的缺位，而非迁移本身。关于城市经济发展，由于存在着乡—城劳动力迁移能够维持城市低工资水平的假设，迁移对城市经济的贡献十分明显：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在国内乃至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关于乡—城劳动力迁移与城市病的相关关系；经验分析表明在低经济增长率条件下，大规模的乡—城迁移极有可能引发城市病；而在能够维持高经济增长的经济中，迁移则完全可能避免城市病。关于农民工挤占了城市人工作岗位的说法，本文不能同意；因为经验分析表明许多下岗工人或失业人员找工作难可能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愿接受均衡价格条件下的工作。

第六章：关于乡—城劳动力迁移战略。提出了关于乡—城劳动力迁移两阶段的战略构想：第一阶段战略重点应该是增强城市经济吸纳农民工的能力，而不宜放在提高农民工的福利待遇上，否则将会削弱城市经济吸纳农民工的能力。第二阶段，重点则放在消除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差别待遇上，提高城市化的质量。

关键词：劳动力 迁移 劳动力市场 三元劳动力市场 就业

Rural - Urban Migration In the Structure of A Three - Labor Market In China

ABSTRACT

The rural - 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is now at a critical historical juncture. However, up to now, it seems that the theories of the rural - urban migration can not give a good theoretical instruction to the rural - urban migration of China, either owing to the hypotheses that can not be verified in China, or the theoretical conclusions that is far from the condition of the country. In view of the above - mentioned facts, the dissertation makes extensive use of the theoretical tools of classical and neoclassical economics in finding a new theory of the rural - urban migration in a three - labor market in China. And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the dissertation recommends a two - stage strategy of the rural - 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In addition, the dissertation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ural - urban mi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dissertation is divided into six chapters as follows:

In the first chapter, the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 of the research is given. And also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outline of the paper is introduced.

The second chapter makes a comment on the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in the area of rural - urban migration, including Lewis' model, the two - sector labor surplus model, the neoclassical model and the Harris - Todaro model. The paper comes to a conclusion that all the above - mentioned models can not be regarded as theoretical guidelines to the rural - 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at present, owing to their hypotheses that can not be verified in the country.

In the third chapter, the paper puts forward another model of rural - urban migration, i. e. a two - stage model of rural - urban migration in the structure of a three - labor market (urban labor market of complete competitiveness, urban labor market of incomplete competitiveness and rural labor market of complete competitiveness). The model assumes that the rural - 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in the first stage, the rural - urban migration is restricted within the two labor markets of complete competitiveness, and in the second stage, the rural - urban migration will go on between the urban labor market of incomplete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other two.

The fourth chapter gives an explanation of why and how the rural - urban migration takes place in China. The paper says there are three major factors that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present rural - 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a rapid increase in GDP, a big wage gap between the two labor markets of complete competitiveness and transition toward market economy.

It is a major topic in fifth chapter how the rural - urban migration exercises influence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oth rural and urban areas in China.

Chapter 6 recommends a two - stage strategy of the rural - urban migration for China. In the first stage of the migration, the primary importance be attached to increasing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urban areas by providing migrants with no welfare currently enjoyed by non - migrants so as to keep the cost of the migration as low as possible (the lower cost or wage means the more jobs); and closing the gap of welfare between migrants and non - migrants in the second stage.

Key Words: labor, migration, labor market, a three - labor market, employment

序 言

改革开放以来，数以千万计的乡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镇，形成了巨大的“民工潮”，一直是中国当代最令人瞩目的人口经济问题之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乡—城劳动力迁移流动规模日益增大，1982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约3000万人，1985年增至4000万人，1988年猛增至7000万人，1992年以来它再度增长至9000万人左右。由于总人口规模和劳动年龄人口在21世纪上半叶将持续增长，乡村产业结构继续转型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乡村剩余劳动力还将持续增加，因此乡—城流动人口的数量仍将增加，估计到2010年将达到1.2亿左右。流动人口进城已有从个体化转变为家庭化的倾向，在一些大城市甚至已出现村落化的现象。

乡—城劳动力迁移并不单是人口迁移问题，它通常是和产业结构转型问题联结在一起的。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往往一方面乡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人口，另一方面城镇又存在大量的失业和贫困人口，这些问题交错在一起成为这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经济现代化进程将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所以，乡—城劳动力迁移问题是人口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关键问题之一。发展经济学是在二次大战后发展起来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迅速增大，大量乡村剩余劳动力人口涌入城镇，

同时城市又存在大量失业人口和贫困人口。因此，对这种情况的研究，特别是对乡—城劳动力迁移问题的成因、运行机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后果及解决问题的途径等，就成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在西方，自1954年刘易斯发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以来，出现了一系列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模型，最著名的如：刘易斯—费—拉尼斯劳动力剩余两部门模型，以乔根森为代表的新古典模型，托达罗模型等。用这些理论模型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乡—城劳动力迁移，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乡—城劳动力迁移问题，至今尚未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因此，不少学者力图打破发展经济学有关乡—城劳动力迁移的原有理论模型的局限，进行修正和创新。

朱镜德博士的《中国三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乡—城迁移研究》一书，最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打破二元经济理论模型的局限，创新性提出了自己的三元劳动力市场模型。他紧密结合中国当前经济发展实现，系统地批判了刘易斯—费—拉尼斯劳动力剩余两部门模型，新古典两部门模型和托达罗模型等，进而划分了城镇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城镇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和乡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三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两阶段乡—城劳动力迁移理论模型”。

他运用自己所创立的理论模型，深入分析了中国现阶段乡—城劳动力迁移的决定因素、特点和流向，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它对中国乡村和城市经济发展的正、负面影响。最后，书中还提出了关于中国乡—城劳动力迁移分两个阶段发展的战略构想，不仅为未来中国乡—城劳动力迁移决策提供了科学论据，而且也提供了新的思路。

自80年代中叶以来，人口理论研究相对落后于人口实证研究和对策研究，人口迁移理论，特别是乡—城劳动力迁移理

论研究较为薄弱。朱镜德博士对中国乡—城劳动力迁移的研究在理论上大胆地进行创新，无疑有利于人口理论研究的发展。然而，人口理论研究今后仍然任重而道远。人口理论研究在人口迁移流动方面也需要一种结合经济转型时期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的实际的，足以说明其发展规模和基本原理的一元化的综合理论体系。本书所创立的关于乡—城劳动力迁移的新的理论模型，可以说，为上述历史任务的完成作出了积极的可贵的贡献。

李竞能

1999年2月8日

目 录

序言	李竞能 (1)
1. 导论	(1)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
1.2 本文理论框架与体系结构	(6)
1.3 本文创新点	(12)
1.4 本文研究方法资料来源	(14)
1.5 若干名词解释	(15)
2. 当代西方人口迁移理论及其在中国适用性之评价	(18)
2.1 刘易斯理论介评	(18)
2.2 劳动力剩余两部门模型与新古典两部门模型 之争及评价	(27)
2.3 托达罗模型评价	(33)
2.4 小结	(40)
3. 中国三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两阶段乡—城迁移理论	(41)
3.1 三元劳动力市场的定义、特征	(42)
3.2 三元劳动力市场概念提出的背景及依据	(48)
3.3 三元劳动力市场概念与三部门概念的比较	(54)

3.4	三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格局	(60)
3.5	三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两阶段迁移理论 (模型)的表述	(66)
3.6	小结	(79)
4.	中国乡—城劳动力迁移分析	(81)
4.1	乡—城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原因	(81)
4.2	乡—城劳动力迁移特点及其评论	(90)
4.3	乡—城劳动力迁移流向及工资收入	(102)
4.4	小结	(115)
5.	中国乡—城迁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关系分析	(118)
5.1	乡—城劳动力迁移与农业经济发展的相关关 系分析	(118)
5.2	乡—城劳动力迁移与城市经济发展的相关关 系分析	(128)
5.3	乡—城劳动力迁移与经济社会利益分配	(139)
5.4	乡—城劳动力迁移与城市病的相关关系	(149)
5.5	小结	(158)
6.	关于乡—城劳动力迁移的若干基本判断和战略建议	(160)
6.1	关于乡—城劳动力迁移发展趋势的若干基本 判断	(160)
6.2	关于乡—城劳动力迁移的战略	(170)
	参考文献	(183)
	后 记	(193)

1. 导 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过程，通常也是其产业结构，尤其是与之有密切关联的就业结构发生重要变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如何实现就业结构的平稳转型对一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其难度也最大。

应该看到，在实现就业结构平稳转型方面，现今中国所面临的任务（相对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及现代化前的西方工业国）更加繁重和复杂，所需解决的问题从时间上看，也更显迫切。

一方面，中国劳动力数量和人口数量极其庞大，而就业结构还处于转型之初期。有关资料表明^①，1996年底，中国劳动力总数是6.88亿，其中农业劳动力为3.47亿，占劳动力总数的50.5%，非农业劳动力为3.41亿，占总劳动力的49.5%。1994年，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农业劳动力占其总劳动力之比

^① 资料来源：中国的统计数字分别来自1997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7年度劳动事业发展统计公告》及统计部门在报纸上发布的消息；国外资料分别来源于世界银行：1986年和1997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重仅为 5%，其中在农业最为发达的美国，农业劳动力只占总劳动力比重的 3%。1997 年，中国人口为 12.36 亿，其中农村人口约为 8.76 亿，占总人口的 70.96%；城市人口约为 3.60 亿，仅为总人口的 29.24%。而西方工业国早在 30 年前的 1965 年，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之比重平均就已达到 72.2%。即使是在与中国同样具有集约农业特征的两个东亚邻国，日本和韩国农业人口占其总人口之比重也已经降至相当低的水平。1995 年日、韩两国农业人口在其总人口中分别只占 12% 和 19%。很显然，无论是城市化水平还是非农化水平，中国都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中国乡—城劳动力迁移工作任重而道远。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早在 70 年代末便步入高速、持续、稳定的增长时期。据 1997 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从 1980—199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高达 10.2%；在 1990—1995 年间，GDP 增长率更高达 12.8%，该两个时期中国 GDP 年均增长率均居同期世界各国之首。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该两个时期，世界平均 GDP 增长率分别只有 3.1% 和 2.0%），也明显高于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速度（该两个时期，低收入国家 GDP 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6.0% 和 6.8%）；与之相联系，在 1985—1995 年期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均增长率也高达 8.3%（同期世界人均 GNP 增长率仅为 0.8%，高收入国家人均 GNP 增长率也只有 1.9%）。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还将能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会随之提高。西方经济学一般理论（如恩格尔定

律^①、规模经济理论^②等)和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结构的经验性分析结论(如钱纳里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战后1950—1970年间发展模式的考察、分析的结论)^③都已表明一个国家随着人均GDP的持续提高,其就业结构一般都伴同整个经济结构发生重要变化。鉴于一国在由农业经济社会向工业经济社会转换过程之中,其就业结构的重大变化一般都与迁移——主要由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或农业领域向非农业领域迁移(即乡—城劳动力迁移)——有直接关联的历史经验,研究中国现阶段及其未来一个时期,由人均GDP增长所引至的乡—城劳动力迁移及其对就业结构转型乃至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变化的影响,就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外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乡—城劳动力迁移的文献可谓极其繁多。然而,迄今为止,为理论界探讨最多,并形成系统的有关乡—城劳动力迁移理论模型,还当属劳动力剩余两部门模式。可是现在用劳动力剩余两部门理论来分析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乡—城劳动力迁移问题,有着明显的局限性。该理论的核心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二元性:即,一方面是城镇现代工业部门,另一方面是传统的农村部门;城镇现代工业部门工资率高于传统的农村部门工资率(假定工业部门工资率和农业部门工资率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完全迁移出该部门之前是不变的);随着城镇现代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张,传统农村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将源源不断地流入城镇现代工业部门

① 请参见4—1部分。

② 同上。

③ 钱纳里:《发展的型式:1950—1970》,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

(假定城镇现代工业部门充分就业)。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两部门工资率趋于一致时为止。

上述理论的描述可能并不符合二次大战后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发生的有关乡—城劳动力迁移的实际情况，它与现今中国所出现的乡—城劳动力迁移情势也相去甚远。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似乎并不仅限于城镇现代工业部门，甚至劳动力的主要流向也不是城镇现代工业部门。因此，就现阶段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乡—城劳动力迁移问题而言，仅仅在两部门经济范畴内探讨就业结构的演变，难免失之偏颇。关于这一点，中外许多经济学家似乎已形成共识。早在 70 年代初，就有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发现两部门学说不足以解释现阶段发展中国家乡—城劳动力迁移的现象，并提出三部门观点。

三部门一说是根据发展中国家就业结构的现状，将其整个经济部门划分为三个：城市正规部门、城市非正规部门、农村部门。该观点认为现今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乡—城劳动力迁移与西方工业化国家在其早期工业化期间所出现的乡—城劳动力迁移的情况有所不同，来自农村的迁移者绝大多数不是直接地被现代工业部门所吸收，而是或直接进入城市非正规部门或直接加入城市正规部门中日益增大的失业大军。到 80 年代，三部门概念已广为发展经济学界所接受。关于三部门概念较为详细的表述，请参见本文 3.1—3 部分。

应该说，三部门观点在表述现阶段发展中国家乡—城劳动力迁移现象上要比两部门理论更加符合其实际情况；然而三部门一说似乎还仅限于概念的提出和对现象的描述上，并未能形成像两部门那样的系统理论。目前关于发展中国家乡—城劳动力迁移与三部门就业结构变化的相关关系分析以及关于三部门

经济结构，特别是关于三部门就业结构的变化、发展轨迹的理论研究还十分缺乏。这一点正如托达罗所指出的那样，“有些问题还不清楚：非正规部门是否仅仅是那些等待进入正规部门的人们的停留地？或者是人们在被正规部门吸收之前，尽可能舒适生活的一个只暂时存在的过渡阶段？是否应在事实上促使非正规部门成为城镇劳动力就业与收入的主要来源？”^① 关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至今无论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经验性分析上都还没有取得重要进展。

在中国，由于其体制的与众不同，相关问题更加复杂。很显然，无论是两部门学说还是三部门理论都不足以解释现阶段中国乡—城劳动力迁移的现象，更难以为中国解决相关（乡—城劳动力迁移）问题提供充分的理论指导。与此同时，国内在相关理论的研究方面似乎也未能取得重大突破。

可能正是由于缺乏相关的理论支持，政府明确而又富有成效的相关政策性举措久久未能出台，相关的体制性变革也迟迟未能发生。这正如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所指出，“（中国乡—城）迁移实际是存在的，但体制却建立在不存在迁移的假设上。”与此同时，许多地方（城市）政府却各自为政，任意地制定排斥或限制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政策。近些年来，这种城市政府干预乡—城劳动力迁移的现象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仅许多大城市如北京、天津，加强了对外来劳动力的限制和排斥，而且还有许多中小城市也纷纷加入了限制和排斥农民工的行列。中国迄今为止的乡—城劳动力迁移完全是（由农民工）自发进行的，而且在整个迁移过程中，似乎也没有得到来自政

^① 托达罗：《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第382页。